

死桥 上册

台湾 邹郎 著 ·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
死桥 上册



1988 · 北京

台湾 邹郎 著 ·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死桥 下册



1988 · 北京

台湾 邹郎 著 ·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死 桥(上、下册)

台湾 邹郎 著

中国**友谊出版公司**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·27 $\frac{1}{2}$ ·572000

1988年7月第1版

1988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057-0081-2/ I · 44

定价: 6.60元



作者像



几时才了乡思苦

——记台湾“抗战小说之王”邹郎

凤 承

借问扬帆操棹者，
此舟可是返乡船？

——邹 郎

“抗战小说之王”，是海内外读者给予台湾著名作家邹郎的美称。

自1949年至1986年，邹郎出版作品多达105部。在他的60多部小说中，抗战小说约20余部。轰动一时的《死桥》，先后被改编为电影和电视连续剧。其作品具有浓厚的东方色彩，洋溢着中华民族精神气节，深为海内外读者所喜爱。

邹郎原名邹龙承。1923年出生于湖北省监利县城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，兄妹五人，排行老大。祖父邹笙虞曾留学日本，是我国早期民法五人起草小组成员之一。父亲邹汉冕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文科，能诗善画，一生志趣于新闻事业，曾在武汉创办了“长江上游通讯社”、《镜报》和《响报》；抗战时期，在家乡创办《监利日报》和《动员

周报》，笔名“铁脑壳”，为一颇有名望的文坛怪杰。母亲刘凤卿毕业于湖北石首县女子学校，一生酷爱诗书。邹郎在父母影响下，不但能做诗题联，还培养了一种强烈的爱国之心。

1938年武汉沦陷时，邹郎年仅15，他因病从中学回乡，在父亲带领下投身抗日宣传的热潮中。1939年，他与表兄蔡光铮等在家乡创办了宣传抗日的刊物《战地旬刊》，他任社长；同时他还兼任父亲主办的两报的战地记者。

1941年，邹郎在父亲的“没有国哪有家”的思想鼓舞下，决定前往四川成都投考黄埔军校。临行时，母亲含泪送至路口，将一枚钻石戒指塞在他手中，并嘱咐说：“保家保国，匹夫有责。”

邹郎从监利步行到四川成都，考入黄埔军校。这时，他的故乡却已沦陷。

邹郎自军校十九期毕业后，参加了八年抗战中最后一年的战斗，在芷江会战中负伤。

抗战胜利后，邹郎回乡探望亲人，才知道在战争中他已失去了几位亲戚和可爱的六妹、七妹，这使他万分悲痛。然而，更使他气愤的是毁家纾难、积极抗日的父亲，在抗战胜利后，竟被那些摇身一变成了胜利官的家伙们捉进监狱。邹郎到县城监狱去探望父亲，却被监狱长拒之监狱门外。邹郎一怒之下，痛打了监狱长，才得以与父相见。

三年后，邹郎的父亲已出狱。他从南京赶回故乡与家人团年。当全家老小聚集在桌前，一同举起那飘香的米酒时，他喜泪不禁夺眶而出……，这是自抗战以来，也是邹郎成年之后第一次享受到天伦之乐！

1949年，邹郎与出外谋生的父亲一同流落香港，后迁居台湾，与失散在台的三弟邹律重逢。但却与在大陆的母亲、二弟及两个妹妹等亲人从此断绝了音讯。

在台湾为生活所迫，邹郎开始了写作生涯，至60年代中，他出版的作品已达50部，大多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长篇小说，如：《死桥》、《地下司令》、《诡路》等等。

60年代末，邹郎眼见中国文化将有被蛀蚀之危险，毅然调转笔锋，写了不少针砭时弊的文章，终入狱。在那段日子里，邹郎虽在小说、电影上已成名，但牢狱之灾使他满头黑发变银丝，家徒四壁，一贫如洗，几乎落得妻离子散。

出狱之后，邹郎仍坚持埋头写作，并创办了一份颇有影响的政论性刊物《文化旗》。他在55岁生日时，填了一首《钗头凤》自勉。词云：

婆娑舞，雷霆鼓，风流骚坛五十五。

世道盪，诗书补，一笔文章，几把阔斧。

虎！虎！虎！

几年后，邹郎出版的作品已达83部。但他主办的“诛文化五恶”的《文化旗》，虽然赢得了海内外著名学者的响应，在出版至第五年60期时却被迫停刊了。事后，他写了一首打油诗。诗云：

也许活得不耐烦，要与奸邪论短长，

办了五年文化旗，几乎又闻牢饭香。

近年来，邹郎又完成并出版了《中国历代兴亡史通鉴》、《中国文学浅说》、《中国神话之研究》、《世界文学史》以及小说《孤线》、《东狐一〇〇》等著作。他

的《中国历代兴亡史通鉴》还是请监利县书画界名人朱期炳、鲁萍庵设计封面和题写书名的。该书出版后，邹郎向家乡赠送，籍表他对祖地、故土、乡亲的眷念。

邹郎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漂泊在外，在几十年的漫长岁月中，他无时不在思念着他的故乡和亲人们。他在早期诗作中，抒发了他的怀乡之情，如：

独步高楼意潜然，烟波流转水连天。

借问扬帆操棹者，此舟可是返乡船？

传闻说他在大陆的母親和二弟已在“斗争”中身亡；四妹、五妹也已“失踪”。父亲伤痛忧郁而离世。邹郎闻讯，悲痛欲绝，为母亲、二弟设了灵堂、立了亡牌。同时，还多方托人登报、写信寻找大陆“失踪”的妹妹和其他亲人。中秋之夜，别家团圆赏月，他却独坐书房伏案写诗《叩月吟》：

悠悠白恨云，愧作八月诗，

相思与君绝，梦魂或许之。

清明节他又写了题为《人皆有墓可扫而我独无》文章，表达了他的哀伤之情。

1978年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中国实行了改革、开放的政策；1979年，人大常委会发表了《告台湾同胞书》。这些壮举，给海峡两岸骨肉分离的人们点燃了希望之火。邹郎又开始多方寻找大陆的亲人。

1979年金色的秋天，邹郎意外地收到了大陆来信，拆信一看，他惊呆了，这不就是传说中早已“失踪”的四妹、五妹和早已“离开人世”的二弟的亲笔信和照片吗！从信中他还得知他日夜怀念的老母仍然健在。真是不可思议！这

一切是梦是幻还是现实？他的弟妹们都已成家立业。他的祖母盼儿孙盼到年过九旬才仙逝。断了30年的线终于又接上了，音讯断绝30年的亲人终于又通了信息。杜甫说：“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。”而邹郎手捧的这封家书却是30年才收到的啊！他心潮澎湃、热泪滂沱。……

1981年中秋节的下午，邹郎终于在香港与阔别34年的四妹重逢了。少小离别的兄妹，在机场众多人中竟然一下子就认了出来，他们拥抱在一起，喜泪如雨、泣不成声。

……

邹郎从录音带里又听到了34年没有听到的母亲那亲切的声音；他迫不及待地给在国内的母亲挂了长途电话，母子两人直接对话了。八旬老母哽咽着唤“儿呀，儿呀……”花甲之子唏嘘着喊“姆妈，姆妈……”电话两边一对泪人，泣不成声，语不成句。……

邹郎坐在沙发里，心情激动、思绪万千，父亲思母他思母的悲惨情景，在他脑海里不停地显现，……当夜，他提笔为母亲写了一首诗：

“七八老母五八儿，四十寒暑两不知，
何时得见洞庭月，照我母子长相持。”

邹郎从手上摘下一枚钻石戒指交与他四妹，让她带给母亲。这就是1941年他离家去成都，送别时母亲从手上摘下来给他的那枚钻石戒指。40年来，他一直带在身边，日夜相伴。“请妈妈养好身体，我们母子会见面的。”邹郎期待着这一天。

是的，母子是会见面的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。

1983年夏天，邹郎的八旬老母在二儿陪伴下到达了香

港，等待与他相见。几天之后，年已花甲的邹郎从台湾急匆匆赶来了，他进门看到满头银发的老娘，奔上前去，扑通一声，双膝跪下，母子两人抱头痛哭起来……。

“姆妈”，邹郎擦着眼泪哽咽着说：“今天我们母子能够重逢，这是大喜事，是不能哭的。”

“是啊，今天大喜，谁也不要哭，要笑的才是。”二弟、三弟在旁边劝慰，虽然他俩也都是泪流满面。

香港的盛夏之夜，很是闷热，人们都愿去海边或去备有空调的电影院、舞厅玩赏，而邹郎与母亲、弟弟却关起门，聚在桌前品尝故乡武汉的美酒“黄鹤楼”和监利的“松花”皮蛋，时而寂静无声，时而又笑声朗朗，他们母子悲喜交加，沉浸在幸运的欢乐之中。

两年后，邹郎的母亲在家乡病故。邹郎不能亲自奔丧，悲恸万分，他跪在母亲遗像前哭道：“一海之隔，近在咫尺，但儿生不能尽孝，死不能送葬，罪人啊！这不是儿的错啊！”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：“数数中国历史，哪有我们这一代这样长久的骨肉分离？哪有我们这一代这样长久的乡思？！”正是：

几时才了乡思苦？何日盼得九州同！

我的写作生涯（自序）



我常说，中国文化之其所以古树盘根万年长青，是端赖中国历代书生之狂妄、骄傲、固执、卓然乃存。

没有超人的智慧和情操岂敢狂妄？

没有卓越的知识 and 传播恒志岂敢骄傲？

没有殉道的精神，岂能享受固执的快乐？

我不敢自命为读书人，但我这一辈子没有放过追求知识的机会，没有放弃传播的恒志，没有放松固执的情操。

一九四九年我到香港，即开始写作生涯。

一九五一年，我来到台湾，即着手编写“世界文学史”，此后便接受了报社和出版社邀约，从事职业性的写作生涯，如此这般十六年，出版了四十六部以中日战争等为背景的长篇间谍小说，另外三部以时事为题材的幽默讽刺散文专辑。

我的作品对出版者而言，都是属于“畅销书”，二十多年，出了多少版本连我自己也不太记得清楚，也无法一一保存，但我坚持了一个出版原则，我永远保留我所有作品的一切版权，即使改编拍摄电影电视长片的多部作品也未例外。因此，我的版税收入，使我文静地安度着别无他求

的读书生活。

有几位现在已成名的作家，以前曾向我求教写战争间谍小说的“秘诀”何在？我毫不保留地告诉他们：

学识和知识是写作的活水来源，理学家朱熹先生有一首七言诗比喻得最为恰当：

半亩方塘一镜开，天光云彩共徘徊。
问渠那得清如许？为有源头活水来。

为了寻求活水源头，势必拾步高山，步入绵亘不断万年长青的中国文化丛林，站在这里着笔描述华夏儿女迎接侵略战争的艺术造诣和奋斗精神，才能使读者看得见飞瀑怒涛的壮景，听得到高山滚鼓的声音。

二

一九六七年，我独力创办《文化旗》月刊，以“太史令”、“东方黑”、“司马千文”、“秦逐客”、“诸葛未亮”等十个笔名，发表了二百多万字的文章，如今整理起来，计有《七闽祸国记》、《小人物笔记》、《快刀集》、《嘻笑怒骂集》、《诛文化五恶》、《疯笛诗集》和《中国文学浅说》等十七部尚未出版的新书，这些新书出版后，我相信你能清晰地听到，我曾本着中国读书人的良知，在“久久腐蚀朱门铜环”门前，敲过“夜半梆声”。

一九七二年的深秋。我半自动半被动地关闭了《文化旗》月刊。这一阵子任性，被知识界前辈先进们称为“愤怒青年”的我，鬓发全白了，牙齿被夜半烧酒和香烟剥落

了一大半，家徒四壁，一贫如洗，几乎把子女们的学业也耽误了。所幸《六法全书》还没有“爱国有罪”一条，在差一点儿就逃不过牢狱之灾的“官司”打完之后，我就改业他去，为了无法一一答复先进文友们责询，我曾写了两首七言诗愧表心机：

许是活得不耐烦，要与奸邪论长短。

办了五年文化旗，几乎闻到牢饭香。

来是清风去是烟，烟波深处好避秦。

放翁之句君知否？“石不能言亦可人”。

三

古语“君子固本小人穷斯滥矣”。不能滥当然只得求变。一九七三年我去香港，新闻界老兵卜少夫逢人便夸称“此人有十九般武艺”，事实上这时候我变成了国语电影的编剧、导演了。

我有沉痛的七言诗纪念我的两年编导生涯，在“一书一剑一青丝、书剑飘零学艺时”的游戏人间，我留下的电影作品，是十二个电影剧本，同时执导了《长江一号》等三部以抗战为题材的彩色宽银幕国语影片。

四

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，由于我拍摄的影片票房都不恶，使我获得超过一百万元的报酬，我便捧着这笔卖艺所得，毅然告别“野柳风景区”，迁居乡村回到了我的旧书房，埋

首追究中国古代神话与中国历史、宗教、文学、艺术的渊源和关系，试图为它们搭建一座血肉相连的桥梁。

这一前无古人的巨匠工作，牵涉到其他各类的专门学问太广太深，我以我的毕生所学，纵有狂妄骄傲，固执的巨匠心愿，也许只能做个抛砖引玉的小工，但是我明白：中国文化的盘根老树下有无数的短枝枯藤，纵使岁月摧折，只要不离开盘根老树，后来人牵藤插枝，总有一天会在老树上开花结果的。

从一九七五年到今天，我的书房虽然愈来愈大，写作却愈来愈少了。去年五月，我把研究比较成熟的一万五千字，在《大华晚报》以《神话、中国古代神话》为题发表求教先进，在这篇文字里，我只概略地引述了中西古代神话的比较和演进，痛陈中国古代神话与儒教的彼此关系。现在继续完成的初稿，有“中西古代神话的比较概论”和“中国古代神话探源”二书。此后十年，计划中的书目十多种。以“著作等身”而言，我的写作年龄还算年轻的，但愿天朗气清惠风和畅，假我以时勤读苦研，完成我个人“邹郎著作一百种”的心愿，未来的岁月对我是优之有余的。

五

今年八月，桂冠图书公司和四季出版公司的主持人赖、叶二君来访，这两位颇有成就的年轻出版家与我素不相识，他们的造访，第一次就表明了目的，希望能以抽版税的方式出版我的全部著作，并且打算将我的旧作重新排版精印专辑发行。第二次他们便带来出版合约和版税定洋。这样一来，我不得不把原已和一位出版界朋友说好而

未订约的出版计划取消了。

长江后浪推前浪，这两位年轻出版家的出版气魄和气质，是值得不讲究的出版界老友们学习的，而对我这个老文匠来说，无疑是非常地安慰和鼓励。本文书成之时，正是我的五十五岁生日，兴奋之余，便填了一首《钗头凤》新词自书挂在客厅壁上，用为表达我的今后写作意志与雄心：

婆娑舞。
雷霆鼓。
风流骚坛五十五。
世道盪，
诗书补。
一笔文章。
几把阔斧。
虎！
虎！
虎！

1977年9月6日写在台北觉国。